

《晋祠周柏图》传奇

胡克均 王任伟

王任藏(1928~2014),宁海深甽镇大里人,世代耕读传家,自少聪明好学,抗日战争期间,毕业于奉化中学,先后在宁海岭口、中胡等地小学任教,解放后调到柘坑小学执教。1959~1962年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他承担国家困难,离职回乡务农。基于文化素养和政治远见,离校时他把校图书馆资料室里一幅积满灰尘、破烂不堪形似废纸的《晋祠周柏图》带回家,用旧报纸包扎起来,秘藏在楼上横梁中。

此画系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、岭南派著名画家陈树人与何香凝合作的一幅中国画。以山西太原晋祠横空出世的周柏作题材,寓意1929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的历史现实,展现作者在逆境中顽强不屈的政治抱负。在横斜的古柏上端空白处,自右至左依次排列着陈树人、汪兆铭(汪精卫)、冯玉祥、邹鲁、谢持、经亨颐六位国民党元老,用毛笔题写的7首绝句(其中汪精卫题了两句)。除谢持外,其他5人都在自撰之诗下方加盖本人红泥印章,左下角盖着何香凝压轴红色铃印。原作高61厘米、宽76厘米。第一次裱装时,在此画两端附上两条白纸,李烈钧、于右任两位国民党元老又分别题上七绝诗各一首,画遂成为当时享誉国内的一幅名画。抗日战争后期,此画竟被上海《申报》社社长陈彬陶获,陈彬把此画转赠给南京伪

“国民政府”主席陈公博。陈逆为抬高自己的政治信誉,将此画第二次裱装,上端又添加一截白宣纸,题了一首七绝诗,并在此诗之后,撰写了77字的说明。然后把它悬挂在南京伪“国民政府”的大礼堂上。

抗战胜利后,此画被蒋介石国民政府收藏。1949年4月,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,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离南京,此画落入任职于国民党“中央干部俱乐部”的宁海籍职员戴昌尔手中。南京解放后,戴昌尔走投无路,只好整理行装及一些书画,返回老家——宁海柘坑村。土改时,他被戴上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。为了显忠新政府,戴昌尔把从南京带回的书画捐赠(或说寄放)给柘坑小学图书馆,供师生阅读和参考。1966年爆发“文化大革命”,当时戴昌尔已病死,他捐赠给柘坑小学的这些书籍和字画,被群众视为“四旧”付之一炬,顿时灰飞烟灭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继叶剑英代表中央对台谈话之后,何香凝之子廖承志发表了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王任藏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,顿时顿悟,中国的政治气候变了!立即给国务院办公厅寄去一信,说自己历经风险、收藏了世人难得一见的民国时期名画《晋祠周柏图》,愿奉献给人民政府。国务院办公厅把此信转浙江省政府办公厅,省政府再转给宁海县政府办公室。县办接信后,立即责令县文化馆派精通书画的



行家去大里王任藏家调查核实。经详细交谈、核实,终于肯定《晋祠周柏图》是货真价实的真品,双方当即办了移交手续,把此画收藏于宁海文化馆。但是消息传开,即被戴昌尔的儿子戴飞常得知,他立即向县人民法院上诉,谓此画系家父从南京带回,是戴家私有财产,寄放在柘坑小学,现应归还原主。经县人民法院调查、核实、调解。县文化馆以当时2万元高价收购名画《晋祠周柏图》。当时,假如不是王任藏的慧眼和魄力,这幅名画已成废纸,或被人抛弃,或在“文革”时化为灰烬。

王任藏不仅在收藏国宝《晋祠周柏图》中,展现了无畏、无私的高风亮节,而且一生低调。家境虽贫寒,却不计名不计利,平生虽未有一官半职,却被村民公认为“秀才”。20世纪末,大里王氏第9次续修《大里王氏宗谱》,他参与搜集、整理资料,撰写文稿,虽非主编却是编委中的顶梁柱。21世纪初,大里人编写《大里村志》,王任藏因年事已高,虽未亲自参与编写,但遇到困难和疑点,总是不厌其烦,细致作答。

名人轶事

史海钩沉

日军掠夺氟石遗址

潘国贤

我1963年就到过象山茅洋,据当地人讲:村边的山过去被“东洋人”占去开采“绿石矿”。所谓的绿石矿,实际是氟石,这是以岩石呈绿色而称呼。氟石是重要的化工原料,可作炼钢时的催化剂。茅洋氟石矿原由宁海人在1926年开办,1941年日军强占该矿并成立“华中矿业公司”,疯狂掠夺矿产资源。1945年,抗战胜利,日军败退,宝矿回到中国人手中。

2月28日,我们5人驱车前往茅洋。经热心人指路,车子进入象山中部五狮山北麓的一座庄园“象山民族文化村”。得知我们是从宁海专程到这里参观“绿石矿”的,工作人员热心领到“根雕艺术展览馆”,我们看到了黑洞洞的矿洞口。里面机器轰轰响着,一辆满载矿石的装载机迎面开来,看来这里还在采矿呢!阴湿的矿洞很不好受,可想当年中国劳工在恶劣环境下,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出了洞口,看到一座六角凉亭,亭内竖立石碑,正面是铁瑛题写的“毋忘碑”,背面碑文镌刻:“1941年5月18日,日军侵占茅洋氟矿,赶走村民,圈定地界,筑起碉堡、炮楼、电椅、活靶子。对周围村庄进行烧杀掳掠,对我采矿劳工进行惨无人道摧残,把矿区变成人间地狱。据载:在茅洋氟石矿受迫害致死而抛入“万人坑”的劳工和村民达2700余人。今逢盛世,特立此碑,以警世人,毋忘国耻,兴我中华。凉亭南侧立有“象山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。凉亭背面有不锈钢小棚屋,安放着玻璃棺,可看到被日军折磨死难矿工的累累白骨。

离开“万人坑”,不远处的“侵华日军伙房遗址”尚在。一位在葡萄园干活的当地老农,主动介绍起当年日军建造的碉堡、营房、杀人场、铁丝网……

驻茅洋侵华日军,曾多次侵犯宁海长街一带,据《宁海抗日纪事》记载:1942年6月12日,驻茅洋日军与伪军400余人,偷袭长街,我军民奋起反击。这次战斗,我方击毙敌人2名,伤3人。我自卫队阵亡1人,伤2人,警察阵亡3人。区警察所及自卫队营舍均被焚毁,长街、大湖遭洗劫。我军民被俘17人,其中8人被惨杀在茅洋,8人脱险,1人生死不明。

日军在茅洋开采氟石运往日本,必经岳井洋。日寇在岳井王家村建据点并强迫百姓构筑碉堡,在此盘踞4年之久……

以史为鉴,毋忘国耻!

沧桑看云

觉园庵的城南旧事

王灵恩

对外而言,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庵堂;于我,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少年栖身之地。这个唤作觉园庵的地方,曾是我在城南的居住之地。

庵堂怎么会成为我的居所?那是特定历史时期开的一个玩笑。

当时文革初兴,破四旧是主调,诸如与封建修沾上边的,均入清扫或打倒之列。我出自基督教家庭,自然不能幸免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我家与其他几户信教的家庭,便在红卫兵的勒令下,从坎头顶耶稣堂的家,迁往南门解放路旁一个叫觉园庵的地方落脚。

当时我年幼不懂事,只觉得在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很杂。大多是穿僧尼袈裟的人,有唤作师傅的,还有刚迁居进来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,构成了这个院子特有的宗教氛围。这当中,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走进走出,与平常市民无殊。只是在就餐前,有一个简短的祈祷仪式,以示虔诚。

小院子,大世界。天主教徒共3位,一男两女。负责的是位男性,类似神父的角色,小孩们叫他吴公。吴公绍兴人,讲话和气,平时在中大街摆摊鞋摊谋生。

我有事没事往他那里跑,听他讲故事。他讲故事时,不时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,用火柴咔嚓一声点上,美美吸上一口,然后,吐出一轮颇有造型的烟雾,那种满足感非小孩能理解。然而他的这一爱好,带来经常干咳或吐痰的副产品。我时常纳闷,有类似信仰之人,不应抽烟呀。时至今日,我才明白,人在压抑与苦闷时,有一种自我排遣的方式。

吴公的一些小细节,我至今印象深刻。他拿着别人的鞋,往机针旁一套,再穿进绿色尼龙线,一手摇着把子,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,另一只手将鞋子绕着转,转了三圈光景,将鞋子取下,娴熟地将鞋帮或鞋底拉几下,确认无误后,交给顾客。

随着年龄长大,我了解到,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的专职神父。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里,他赖以服务的天主教堂被没收了,他只好以简单的手艺,做一个自食

其力的劳动者。大概他抽烟之习,是无奈的叹息。

有意思的是两位修女,大人管她们叫嬷嬷。温州嬷嬷身材不高但气质不错,人缘较好,与我母亲较谈得来。另一位黄岩嬷嬷身材较高,性格躁,脾气有点怪异的,常独来独往。她有一手治疗眼疾的手艺,诊所开在市门头。说它是诊所,其实有些夸大,也就是个屁股大的摊位,却时常有人慕名前来就医。虽说行医不缺钱,但这位嬷嬷相当节俭,甚至到吝啬的地步,以至邻里在背后说她。在天主教徒的三人世界里,她略显孤单,套用现在的话,叫情商低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她谢世前一个晚上,从老家来了一拨侄儿侄女,准备她的后事。据说这一晚,她一直呆呆地望着房顶,一眨也不眨。她在望积聚起来的钱!那钱用报纸包扎,塞在房顶的椽上呢。她去世后,清理出来一本眼科教材书。我好奇地拾来翻阅,发黄的书页中夹着一张她的照片,气质上佳,打扮入时,给少年的我留下印象至深。

她对存钱的惦记,是有缘由的。文革初期,红卫兵到天主堂去“革命”。黄岩嬷嬷的金银细软,都藏在教堂的大屋柱中,由于害怕红卫兵抄走,常对着那根柱子发呆,口里念念有词,估计是“天主保佑”之类的祈求。这个反常现象被一位眼尖的红卫兵发现,于是秘密大揭底,金货全被没收,她一下子瘫坐在地。这,也成了邻里饭后的谈资和长久的笑柄。

平日里,吴公作为实际负责人,显然有其领导的定力,给人办什么事总是气定神闲,从容不迫。

我因家住觉园庵,小时怕别人问家住何处。原因很简单,怕别人背后指指点点:“喏,其家住在摆不上台面的地方!”因此,我一直回避家里的确切地址,要是拗不过同学的追问,至多说“南门外”之类宽泛的地名搪塞,像做贼似的。

当时南门外人这个称呼,有点贫困的象征意味。在很长一段时间,南门角是宁海的好几个档次,哪像现在的南门,背山面水、冬暖夏凉,徐霞客大道桃红柳绿、新住宅鳞次栉比……

温州龙湾抗倭城堡

(王方 摄)

老照片



忠义堂



城墙



卫所

九崮山剿匪七英烈

鲍英清

60多年来,每年清明日,胡陈乡东仓小学师生都要去大赖村石柱里的烈士墓前,祭奠革命先烈,听老干部尤宏章介绍剿匪事迹。

1949年,蒋介石败退到台湾,宁波、宁海先后解放。驻在我省的国民党交警部队(群众称长江部队),也从石浦落海,逃到渔山岛、大陈岛去了。可宁海东南沿海,还有少量的国民党残余势力。他们勾结土匪,扰乱地方,妄想东山再起。1951年7月初,一股

80余人的顽匪,从据点渔山岛趁夜色偷渡来宁海、象山。他们从象山寺前渡上岸,带着美式装备,穿着解放军服装蒙过群众,直奔宁象交界的廿四炮九崮山。不管敌人多么狡诈多变,不到一天,我方就掌握情报,即命宁象两县的县大队配合当地民兵,上山围剿。宁波军分区的解放军也日夜兼程下来,步行到东仓赖家,由老农赖大连带他们到王家山参战。

战斗在7月3日凌晨打响。由于我军战斗英勇,地形又熟悉,各个据点的敌人很快被大部歼

灭。敌人中有不少是当地的土匪,能说一口当地的方言,胡陈乡夏家村的两位民兵,就是听到他们的喊话,看外衣似解放军,被騙过去杀害的。

敌人的本性又是残忍的。象山县独立营的李继浩烈士,在战斗时看到据点有两个敌人,手举白布,以示投降。李继浩收缴战利品心切,奔过去收缴枪支时,被隐蔽在岩洞中的顽敌射出子弹击中颈部。李继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扣动扳机来了个连发,当场击毙顽敌。他自己也英勇牺

牲。

这场战斗,多名顽敌被我军击毙,还有几个残匪装假死,睡在死人堆中,在我军清场时被活捉。

我方5位解放军战士、两位民兵牺牲,从此长眠在烈士陵园。

5位解放军烈士,当初安葬在东仓成济庙旁,后来政府把他们迁葬到大赖石柱村,专门造了烈士墓,让人们可以永远怀念他们。

红色档案